

分类号  
U D C

密级  
编号 10741

兰州财经大学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硕士学位论文

(专业学位)

论文题目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推进  
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研究生姓名: 黄杨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狄瑞鸿、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应用经济学、金融硕士

研究方向: 投资理财

提交日期: 2023年6月10日

##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黄杨 签字日期： 2023.6.10

导师签名： 张冲 签字日期： 2023.6.10

导师(校外)签名： \_\_\_\_\_ 签字日期： \_\_\_\_\_

##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 同意（选择“同意”/“不同意”）以下事项：

1.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內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黄杨 签字日期： 2023.6.10

导师签名： 张冲 签字日期： 2023.6.10

导师(校外)签名： \_\_\_\_\_ 签字日期： \_\_\_\_\_

#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development o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Gansu Province

**Candidate : Huang Yang**

**Supervisor: Di Ruihong**

## 摘 要

共同富裕自毛泽东时期被提出一直主导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奋斗的方向，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脱贫，工作重心转移到减少相对贫困、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上面。2021年共同富裕示范区正式落地浙江，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为实现共同富裕，我国打响脱贫攻坚战。在脱贫攻坚进程中，扶贫模式也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同时提出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创新创业激发了市场活力，同时具有减贫效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共同富裕有了更多助推方式，其中数字普惠金融异军突起，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缩小收入差距、促进乡村振兴等方面获得了重大成效，推动了共同富裕的进程。甘肃省地处我国西北欠发达地区，对于全国实现共同富裕至关重要，近年来经济发展虽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整体富裕水平仍落后于全国。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分析了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的现状，构建了共同富裕地级市层面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及其异质性；其次，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创业活跃度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之间的中介效应。

经过研究检验，本文得出以下结论：第一，面对甘肃省各项指标落后于全国的客观状况，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一级子维度都对共同富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第二，创业活跃度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创业活跃度来促进共同富裕。以上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更换共同富裕指标测度方法等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加快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鼓励大众创业，提高创业活跃度、发展地方特色文旅经济、加强居民能力建设、强化金融监管和市场监管等多项措施，通过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提高创业活跃度来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 共同富裕 固定效应 创业活跃度

## Abstract

Common prosperity has been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struggle since it was proposed by Mao Zedong. In 2020, China will achieve compreh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the focus of work will shift to reducing relative poverty, narrowing the gap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2021, the demonstration zone for common prosperity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in Zhejiang. The 10th meeting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tudied the issue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a solid way. In order to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China has launched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In the proces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model has also changed from "blood transfusion" to "hematopoietic", and the concept of "mass innovation, mass entrepreneurship" has been put forwar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market and have the effect of poverty reduction. With the progress of the times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re are more ways to boost common prosperity. Among them,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has sprung up, which has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narrowing income gap, and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has promoted the process of common prosperity. Gansu Province is located in the underdeveloped area of

northwest China, which is crucial to the realiza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Althoug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made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2011-2020, the overall level of prosperity is still behind the country.

Based on the above background, this paper comb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Gansu Province, and constructs an indicator system at the prefecture-level and city-level of common prosperity. On this basis,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Gansu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dex from 2011 to 2020, we use the two-way fixed effect model to test the role and heterogeneity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common prosperity; Secondly,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is used to test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between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After research and test, this paper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First, in the face of the objective situation that various indicators in Gansu Province lag behind the national level,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its first-level sub-dimension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Seco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has an intermediary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an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by increasing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e above conclusions are still valid

after considering the endogenous problems and changing the measurement methods of common wealth indicators.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conclusions, it is proposed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encourage public entrepreneurship, improv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develop local culture and tourism economy, strengthen residents' capacity building, strengthen financial supervision and market supervision and other measures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b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increasing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Key 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common prosperity; fixed effect;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 目 录

<b>1 绪论</b>	1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1.1.1 研究背景	1
1.1.2 研究意义	3
1.2 文献综述	4
1.2.1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	5
1.2.2 关于共同富裕的文献综述	8
1.2.3 文献评述	10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1
1.3.1 研究内容	11
1.3.2 研究方法	13
1.4 创新点	14
<b>2 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b>	15
2.1 理论基础	15
2.1.1 金融发展理论	15
2.1.2 信贷配给理论	17
2.1.3 金融包容理论	18
2.1.4 创业减贫理论	18
2.2 研究假设	20
<b>3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现状分析</b>	22
3.1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22
3.1.1 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22
3.1.2 甘肃省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现状	24
3.2 甘肃省共同富裕相关因子现状	25

3.2.1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25
3.2.2 地区生产总值 .....	26
3.2.3 恩格尔系数 .....	27
3.2.4 社会保障 .....	28
3.2.5 科研投入 .....	28
<b>4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b>	<b>30</b>
4.1 变量的测度与说明 .....	30
4.1.1 共同富裕指数的测度 .....	30
4.1.2 共同富裕指数测度结果分析 .....	31
4.1.3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	32
4.1.4 创业活跃度 .....	33
4.1.5 控制变量 .....	34
4.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	34
4.2.1 数据来源 .....	34
4.2.2 变量描述性统计 .....	35
<b>5 实证设计和结果检验 .....</b>	<b>38</b>
5.1 基准回归模型 .....	38
5.1.1 模型构建 .....	38
5.1.2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	38
5.1.3 稳健性检验 .....	41
5.2 中介效应模型 .....	45
5.2.1 模型构建 .....	45
5.2.2 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	45
<b>6 结论及对策建议 .....</b>	<b>48</b>
6.1 结论 .....	48
6.2 对策建议 .....	49
6.2.1 加快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	49
6.2.2 鼓励大众创业，提高创业活跃度 .....	49
6.2.3 发展地方特色文旅经济 .....	50

6.2.4 加强居民能力建设 .....	50
6.2.5 强化金融监管和市场监管 .....	51
6.3 本文的局限 .....	51
<b>参考文献</b> .....	<b>52</b>
<b>附录 1 共同富裕指数计算结果（熵值法）</b> .....	<b>59</b>
<b>附录 2 共同富裕指数计算结果（主成分分析法）</b> .....	<b>60</b>
<b>致 谢</b> .....	<b>61</b>

# 1 绪论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1.1.1 研究背景

“共同富裕”一直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毛泽东时期被首次提出，要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解决社会矛盾，使农民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时期，认识到社会主义不应是贫困的，并且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帮助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 2035 年目标和 2050 年目标，鲜明地体现了改善人民生活、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

十三五时期，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段性战略目标是帮助尾部群体摆脱绝对贫困。2021 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在解决了全体人民温饱问题，实现全面小康的同时，我国主要社会矛盾发生了转变，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我国经济社会“做蛋糕”和“分蛋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至此，为实现共同富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福利政策建设以及完善分配制度成为新的工作任务。

对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为接下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打下坚实理论和实践基础。2021 年 6 月 10 日共同富裕示范区正式落地浙江。2021 年 8 月 17 日，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会议研究了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以上举措表明中国正在昂首阔步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实现共同富裕”成为百年新征程的重大议题。

我国已经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根据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显示，近十年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已经实现翻倍，2020 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是 2012 年的 2.05 倍，农村居民为 2.32 倍，居民恩格尔系数由 33% 降到了 29.8%。但目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依然较大，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由 2011 年的 2.9 倍下降到 2020 年的 2.56 倍，仅仅下降了 11.7%。数据显示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 2011-2020 年维持在 0.462-0.474 之间。说明我国发展不均衡问题仍显著，与实现共同富裕还有一定的距离。

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不言而喻，我国近年来在经济社会富裕程度方面取得的重大成就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那么为实现“共同”，普惠金融这一概念进入我们的视野。普惠金融被定义为能有效和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其初衷意在强调通过金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提高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实现以较低成本向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者提供较为便捷的金融服务。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的理念。2015年底，国务院发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对普惠金融事业进行了更具体的部署。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以及网络基础设施的普及，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2016年9月，中国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上正式发布《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倡导利用数字技术推动普惠金融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独特优势在于通过互联网能够更加便捷地满足客户的金融需求，缓解了金融服务对低收入群体及贫困群体的排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金融资源的利用率；作为传统金融的补充，促进了金融行业整体的持续均衡发展；能够为所有社会阶层和大众尤其是小微企业、贫困人群等特殊群体提供金融服务。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最初重点关注的是银行物理网点和信贷服务的可获得性，但随着国家政策的引导，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都得到了有效加强。截止2021年12月底中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9.04亿人；2021年，我国银行机构共处理网上支付业务1022.78亿笔、金额2353.96万亿元，分别是2012年的5.32倍和2.86倍<sup>①</sup>；按照艾瑞《2022年中国消费金融行业研究报告》的统计口径，互联网消费贷款余额约为4万亿元；2021年互联网人身保险保费累计规模达到2916.7亿元，是2014年的8.26倍；2020年底，互联网理财投资市场规模已达到25.86万亿元，2021年，我国互联网理财用户规模达到了6.3亿人<sup>①</sup>。由此可见，数字普惠金融依据其独特优势获得了人们的认可，是符合当今社会发展和我国人民真实需求的金融体系。

总结我国近年来的扶贫和发展经验，提高居民就业水平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的有效方式。随着我国经济体系的完善，各传统行业发展走向成熟，依靠提

<sup>①</sup>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网，下同。

升就业水平提高居民富裕程度、缩小贫富差距就要引导人们充分发挥其自身主观能动性，进行创新创业。由此，我国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新举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能够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开拓更多的就业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收入差距，从而促进国家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站在微观个体角度，创业的目的说是为了更加富裕，因此资金支持成为阻碍创业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微观个体可以借用线上平台信息传递优势打破空间和信息壁垒，有效缓解信息约束和融资约束，极大地降低了创业门槛，解决资金支持对于创业的限制，进而增加居民的创业机会。数字普惠金融依靠其数据资源、现代信息网络、信息通信技术，在技术支撑、应用场景等方面为创业活动提供了更多可能，也能够通过影响市场规模、加快信息交互和思想传播等途径培育创业机会和丰富创业资源。与此同时，我国在数字普惠金融的实践也逐渐多样化，新的产品、服务不断推出，涉及服务“三农”、精准脱贫、小微企业融资与智慧城市建设等方面，同时也开拓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故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并以此提升创业活跃度不失为促进共同富裕目标早日实现的有效路径。

甘肃省地处我国西北地区，资源禀赋、人文和地理环境相比东部省份具有较大的差别。2020年甘肃省总人口占全国比重为1.77%，但其国民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0.89%<sup>①</sup>，在富裕程度方面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近十年在全国也一直处于落后地位，但置于本省发展角度分析，其数字普惠金融近年来获得长足进步，并仍具有较大地发展空间。基于以上思路，提高就业从根本上促进甘肃省居民富裕水平，由于甘肃省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与脆弱性，再加上机械化和智能化的普及，由政府引导通过传统劳动力密集企业大量带动就业并不现实，因而居民进行创业就业成为有效方式。因此，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探究本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为巩固甘肃省的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脱贫人员再次返贫，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效路径。

### 1.1.2 研究意义

金融是经济高质量运转的“血液”，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金融行业的整体可持续均衡发展。共同富裕旨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一方面要做大蛋糕，另一方面要分好蛋糕，也就是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落实好分配制度，在人均收入以

及人均消费增长的同时，缩小差距。数字普惠金融因数字拥有便捷性，因普惠拥有易得性，从而为广大创业者提供金融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防止返贫。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共同富裕，研究二者的影响机制，对于政策调整具有指导意义，从而为推进共同富裕扫除障碍，指明道路。已有文献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影响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提高创业活跃度以及推动共同富裕。本文从创业角度来分析，以甘肃省作为研究对象，旨在进一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通过创业活跃度促进共同富裕，考察创业活跃度在其中的中介效应，得出相应结论，并提出相应的促进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时代目标贡献绵薄之力。

### （1）理论意义

目前，诸多学者针对共同富裕进行了研究，从各个方面研究促进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以及实现路径。数字普惠金融从诸多方面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增进了民生福祉。但是对于共同富裕衡量指标体系的构建，多数停留在省级层面。本文在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构建出各地级市共同富裕指数，以此来验证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本文具体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研究视角深入到一个省份，为已有研究结论提供强有力的佐证与支持，并为针对其他省份或地区的研究提供借鉴。

### （2）现实意义

通过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能够指导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方向，更加高效地实现共同富裕。数字普惠金融的应用广度不断拓宽，应用深度不断加强，缓解了传统金融服务的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也解决了金融服务在地域空间上的限制，使得广大人民群众更便捷更高效地获得金融支持，促进私营及个体从业人员灵活就业，促进金融市场参与度，盘活存量资金，从而增进民生福祉。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从金融视角为甘肃省提供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并为返贫提供“安全垫”，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

## 1.2 文献综述

国内外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丰富，但对于共同富裕的研究国外文献极其稀少。因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是我国提出的具有一定政治特性的奋

斗目标，并考虑研究成果对我国国情的适用性，故只对国内关于共同富裕的文献进行梳理。

### 1.2.1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

从现有研究来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在促进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减贫增收、提升社会保障水平以及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对于促进经济增长，Kapoor et al. (2014) 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推动经济发展。钱海章等人 (2020) 采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法等方法，检验了中国的数字金融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张蕊和余进韬 (2021) 的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够促进企业发展，并对企业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其对企业发展的调控作用，却由于城市的行政区划、地域等因素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王永仓、温涛 (2020) 研究表明，无论从总体视角还是各子维度视角来看，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薛莹等人 (2020) 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金融技术可以有效地促进资源配置、创新、提振实体经济，从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观点。蒋长流等人 (2020) 的经验研究表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且具有“门槛效应”。李林汉、李建国 (2022) 运用平滑转移回归模型 (PSTR) 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并且呈现出非线性关系，经济开放在其中也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

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一些研究人员使用了北大“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成果，证明了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收入差异的消减起到了促进作用。胡善成等 (2022) 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收入差距之前存在“U”型关系，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资本错配存在倒“U”型关系，数字普惠金融的确能够缩小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但前提是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

在减贫增收方面，Park 等 (2015) 以亚洲 37 个国家及地区为例，通过对其数据的分析，发现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扶贫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数字化普惠金融可以对扶贫产生积极的影响，且其效果较传统普惠金融更为显著。Qinghan Zeng 等学者 (2022) 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劳动收入的影响，得出数字普惠金融能

够显著增加劳动力收入的结论，但此结论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劳动力收入的增长，这种增长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Jian Ye 等学者（2021）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提高城乡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并且对于城镇居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促进作用更大。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效应在欠发达地区高于发达地区。杨林、赵洪波（2022）聚焦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增收的助力作用，通过增加农民的工资性、经营性、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提升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之下，运用数字普惠金融来实现农民增收，还要发挥财政的托举作用。周立、陈彦羽（2022）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收支差距方面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其原因是当前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仍有待提高。其研究同时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对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和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在拉动居民消费层面，易行建等（2018）的研究表明，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和方便居民支付等途径，对居民消费产生明显的拉动作用。Li（2020）等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还能通过扩大投资渠道，提高可支配收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涂颖清、万建军（2022）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在数字性和普惠性两发面发挥了作用，提升了中国的整体消费水平。Shuang Song 等（2022）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正向促进了居民消费，并且这种促进效应在二三线城市要强于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在消费角度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应该加大在二三线城市的发展与普及，从而更大程度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居民消费的作用。Chuanjiang Yu 等（2022）考察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他将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分为生存型、享乐型和发展型，发现其中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发展型消费结构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同时由于“数字鸿沟”问题在不同年龄人群中严重程度不同，数字普惠金融对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在年龄方面存在明显的异质性。Jennifer T. Lai 等（2020）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家庭抵御暂时性收入冲击地能力，原因是数字普惠金融导致家庭消费对于收入更加敏感。Wang Zerong 等（2022）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国家庭的负债率起决定性作用，通过提高消费水平，释放流动性约束影响负债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负债率过高。

此外，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乡村振兴和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也具有积极作用。金婧（2022）在共同富裕的大背景之下，构建了我国乡村振兴的指标体系，

并以此为基础，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影响乡村产业振兴，并且存在区域经济越发达，影响效应越强的地域异质性。陈亚军（2022）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针对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效果和结构分异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汪亚楠等人（2020）利用中国城镇居民的面板数据，从居民的收入与就业两个方面对数字普惠金融和社会保障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焦云霞（2022）根据非参数 KDE 对我国数字普惠金融的整体发展态势进行研究及描述，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较快，发展的差距逐渐扩大了，但总体来看发展差距在不断收敛。传统金融基础好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通过测算 Moran' s I 指数与空间 Markov 链估计，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空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性，并且这种空间相关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先减小后增强。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与创新创业之间的关系，Guyuan Han 等（2019）学者运用工具变量法和空间 SDM 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创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创业之间呈现“U”型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创业、带动创新，也可以促进创新、带动创业，但前者更有效。吕爽、谭军华等（2022）结合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的三大系统性范畴，选择成果产出、要素投入、社会环境、经济发展 4 个维度，构架了中国创新创业活跃度评价指标体系。李晓园、刘雨濛（2022）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水平、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建设来显著提高创业活跃度，并且影响效应在创业主体和空间上存在异质性。翟仁祥、宣昌勇（2022）基于长三角地区 41 个城市，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一方面从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创业优惠政策以及良好的营商环境来吸引人才，激发创业动机和创业行为；另一方面城市居民的资本累积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从需求端促使了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高。并且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韩亮亮、彭伊等（2022）依据共同富裕的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三方面构建了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促进了共同富裕，并且创业活跃度作为中介变量间接的影响了共同富裕。

## 1.2.2 关于共同富裕的文献综述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共同富裕”的理论方面，我国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丰富和充实，并在解释共同富裕的内涵、衡量共同富裕的程度、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等方面做出了贡献。

覃诚、方向明（2022）利用 Cite Space 软件对 CNKI 收录的 1017 篇共同富裕相关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针对共同富裕领域的研究仍未出现高产作者群体，并且此领域的研究者、研究机构之间合作关系并不紧密；目前主要有四个研究重点：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政策演进、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当前时期研究前沿是“如何在新时代实现共享发展”。

共同富裕具有一定的政治底蕴，从政治的逻辑视角来研究共同富裕是不可或缺的。郁建兴、任杰（2021）认为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前提，共享是共同富裕的核心，可持续关乎共同富裕的稳定。那么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就成为我国衡量共同富裕进程的三个关键因素。李军鹏（2021）认为，共同富裕体现的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富裕还有精神层面的富裕，是生活丰裕、生态优美、社会和谐、公共服务体系完善的富裕。杨宜勇、王明姬（2021）将共同富裕拆分为“共同”和“富裕”两个层面来理解，由“富裕差异性”和“富裕共享性”来衡量“共同”，而“富裕”又分为“物质生活富裕”“精神生活富足”和“生活环境宜居”三个方面。关信平（2022）认为在现阶段，“富裕”、“共同”在我们的共同富裕之路上，其内涵是多种多样的，也是特殊的，必须从多方面入手，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发展。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将社会政策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公正等方面的目标进一步提高。张扬金、邓观鹏等（2022）指出，在实践中的共同富裕必然是一个渐进、曲折、累进式的、漫长的、有一定历史意义的进程，必须通过观念引导、机制建立、实践创新、氛围营造等方式来提高人民群众的认识与意识，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切实推动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进程。

刘培林、钱滔等人（2021）尝试对共同富裕进行指标测度和评价，并且认为必须同时从总体富裕程度、发展成果共享状况、共同富裕实现过程和实现程度等诸多方面进行度量，要引导缩小地区以及贫富差距并且要坚决摒弃平均主义。钞小静、任保平（2022）认为新发展阶段下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包括共享主体：全

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享内容：物质财富与精神成果的全面共享和共享方式：更加平衡的分配格局 3 个层面，并且从收入与财产、发展能力和民生福祉三个维度构建了新发展阶段下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使用五级分类法对各个基础指标实现共同富裕的程度做出初步判断，采用“横纵向拉开档次法—BP 神经网络分析法”的复合方法对共同富裕指数进行合成。

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也是当前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

万海远（2022）总结了我国共同富裕改革的三种模式，归纳了共同富裕的底层逻辑。并提出了从收入结果到消费动力、从事实问题到调控工具、从独立领域到战略体系、从经济增长到社会和谐、从单项突破到全局推进、从经济结果到道路模式六条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逻辑思路。徐政、郑霖豪（2022）认为共同富裕必须是站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之上的，反过来看共同富裕也是成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结果。推进高质量发展与实现共同小康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促进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小康的实现途径。齐红倩和张佳馨（2022）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共富”进程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不同区域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显著的溢出效应。他们还看到，后富地区对先富地区的消费习惯和行为进行了模仿，从而完成了对先富地区消费增长的示范效应。先富地区的消费增长通过各种途径，可以提高后富地区的人均产出，从而进一步地，可以通过提高收入分配，来推动后富地区的消费增长。

何德旭、王学凯（2022）认为金融可从三方面助力共同富裕，其一推动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城乡区域均衡发展，强化产业协调发展；其二通过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引导和支撑科技创新，绿色金融推动绿色发展，加强金融监督管理来防范风险；第三，通过规范来限制不正当的收入，从而推动中产阶层的发展，以及公用基础事业的平等。马艳、冯璐等（2022）构建了我国非公经济与共同富裕关系的三重逻辑，得出我国非公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环境为前提条件，以非公经济内生社会主义因素为内在机理，以员工持股等形式的企业制度创新为作用路径。周文、司婧雯（2022）认为民营是民富的基础，民营企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民营企业的发展是推动共同富裕进程的关键。此路径实现共同富裕要求民营企业针对自身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和及时调整市场布局，并且需要完善的制度给予保障并且进行价值引领。

蒋永穆和谢强（2021）认为，应从稳定脱贫、多渠道就业、优质教育、公平

分配、健康中国、稳步推进共同富裕。魏后凯（2021）提出，要达到“共富”，必须大幅缩短“两山一水”之间的鸿沟。许永兵（2022）提出，在高质量共同富裕发展过程中，要形成一种“橄榄形”的收入分布模式，而“橄榄形”则是要拓展中产阶级。在新的发展时期，要进一步扩大我国的中产阶级，必须坚持稳定的增长，坚持就业优先的方针，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加强再分配的调节力度，针对重点对象进行“精准扩中”。朱萌萌和林子华（2022）提出充分就业才能真正达到所有人都享有共同的繁荣。要促进新就业形式下工人的职业发展，必须提高工人的职业技能，以激发工人的职业发展活力；二是以科技进步为动力，促进落后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加强对新就业形式工人的法律保护，推动全体劳动者的发展。

袁媛（2022）要想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就必须要进行多样化的统一。要在新时期，发挥“四种力量”的作用，即市场力量、精神力量、制度力量和道德力量，探寻新时期共同富裕的多种途径。吴卫星（2021）认为，要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加快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与创新，以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陆培丽、彭兰凌等（2022）通过建立地区间的碳转移支付平衡模式，进而通过调节地区间的收入，优化地区间的收入分布，从而达到促进地区间经济发展的目的。张金林和董小凡（2022）利用 CHFS 的微观调研资料，建立了一套共同富裕指标体系，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促进共同富裕，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活力则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

### 1.2.3 文献评述

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对于数字普惠金融依据其特有的优势所带来的好处覆盖范围广阔，对此的研究也甚多。对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也是百花齐放，各界学者都提出了合理有效并且有实践意义的措施与路径。但目前针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影响和影响机理的研究甚少，对于创业活跃度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所起到的作用更鲜有研究。一些学者研究了可支配收入、消费等作为中介变量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的中介效应，那么，对于甘肃省创业活跃度可能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之间起到一定的中介作用。本文基于此问题，以甘肃省为研究对象，在市级面板数据完整性与方法成熟性的前提

下，采用双向固定效用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影响进行评估，对于实现共同富裕进行政策调整具有实践性的指导意义。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1.3.1 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历程以及共同富裕的背景进行详细的介绍，并基于这些理论依据提出理论假设。其次，根据相关文献，尝试对与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评估，利用北京大学发布的 2011-2021 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甘肃省统计年鉴以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 2011-2021 年的相关数据，构建回归方程，拟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并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在满足稳健性检验的前提下，对创业活跃度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中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检验。再次，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创业活跃度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来疏通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作用路径，从而寻求加快共同富裕进程、促进共同富裕的方法，为政策调整提供参考与指导。

本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是绪论部分，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介绍文章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给出本文的总体研究思路和整体结构，以及可能的创新点。

第二章是理论基础与理论假说部分。全面介绍数字普惠金融和创业减贫的相关理论背景，并通过分析推导出相关的理论假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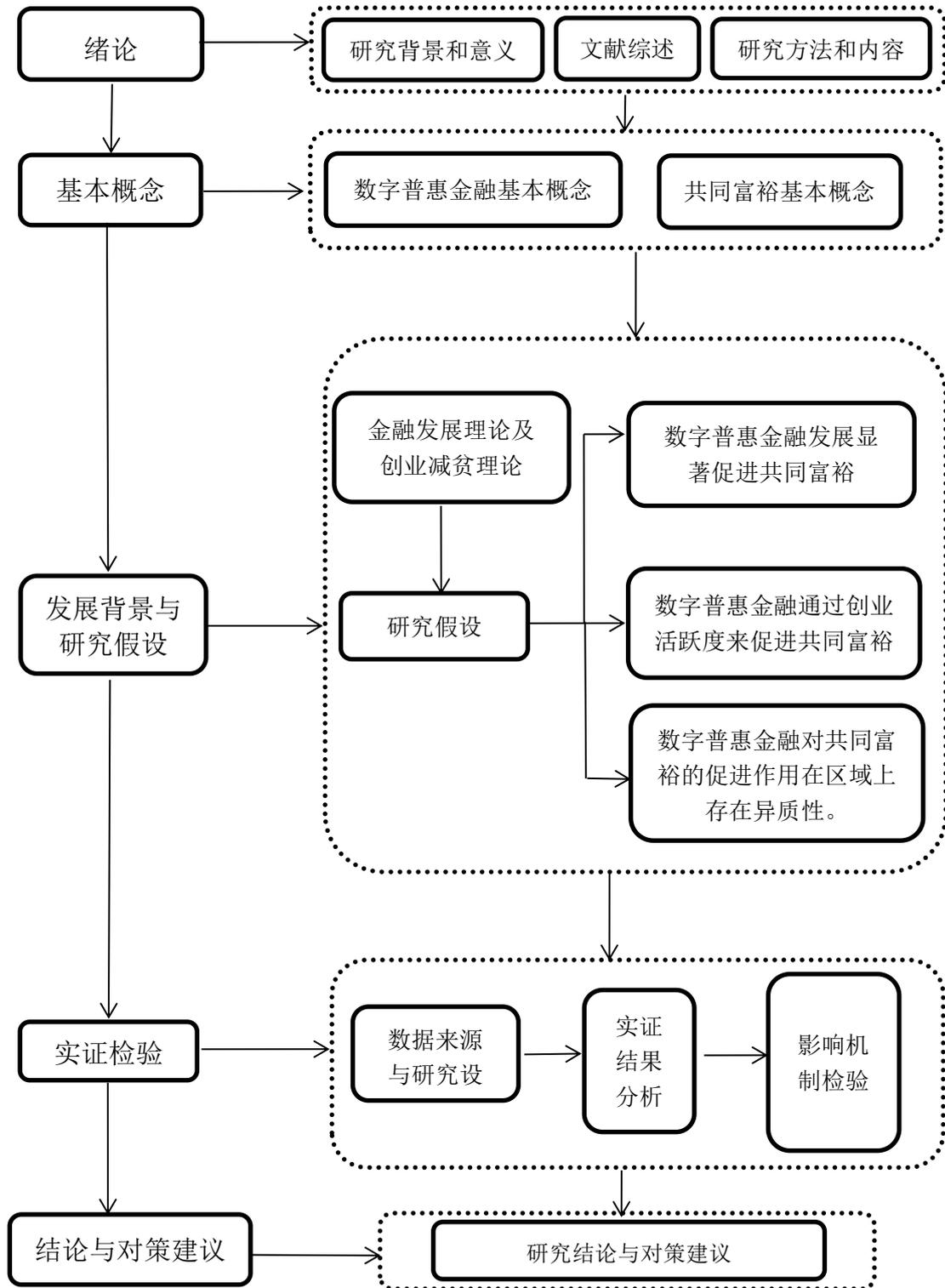
第三章对有关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基本概念的界定。分析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的现状。

第四章是本文的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部分。第一部分参考相关文献构建共同富裕指数以及创业活跃度的度量，介绍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选取；介绍模型所选取的控制变量及其选取依据；第二部分介绍本文所选取指标的数据来源以及对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第五章是本文的实证结果分析，包括创业活跃度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

裕中的机制分析。对于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促进作用的实证结果，首先是对其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分析，结合对各市共同富裕程度进行测算的结果，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然后，进行稳健性检验，通过替换控制变量、更换共同富裕指数合成方法以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等进行检验，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并运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最后，对创业活跃度的传导机制进行分析。

第六章则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指出文章的局限性，并依据结论提出相关的建议和得到相应的启示。



### 1.3.2 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定性分析法和实证研究法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进行理论和实际的综合分析。

文献分析法。本文使用线上检索平台和数据库查阅了大量关于数字普惠金融

与共同富裕的相关资料，并归纳国内外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相关文献现阶段的研究。根据现有文献的研究，学习其实证模型与实证方法，结合本文的研究内容进行整理、修正和补充。

定性分析法。本文对所研究问题的内容和现象进行总结和解释，回顾整理了金融发展理论、信贷配给理论、金融包容理论和创业减贫理论，探讨了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相关指标的发展状况，为实证分析奠定基础。

实证分析法。本文结合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知识，采用市级面板数据，拟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全面考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进行机制分析，分析创业活跃度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间发挥的“桥梁”作用。

## 1.4 创新点

共同富裕是物质与精神的综合概念，现未有较权威的共同富裕指数，但学术界在此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与尝试。基于各位学者对目前共同富裕的研究，针对共同富裕程度指标的衡量尚且停留在省级层面，为本文构建衡量地级市共同富裕指数提供了思路，同样也是本文面临的挑战。其次将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研究视角深入某一省份，进行具体分析与研究，为实现共同富裕“因城施策”提供理论基础，是本文的另一创新点。

## 2 理论基础及研究假设

### 2.1 理论基础

#### 2.1.1 金融发展理论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以发展经济学为基础，以推动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改革、保障人民生活为出发点，西方经济学家进行了深入研究，金融发展理论在此过程中产生。在发展经济学早期，西方经济学家将资本积累、计划经济和工业化作为助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此时金融发展并未受到重视。发展经济学进入第二阶段后，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学派的观点占据了主流，以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并就此发表了相关专著，金融发展理论被正式创立。

##### (1) 金融结构理论

在雷蒙德·W.高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中，金融发展就是一国金融结构的改变，这一理论在他的思想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一个具有健全的金融结构的国家，它的金融市场就会更加发达。因为，一个成熟的金融机构以及多种多样的金融产品都会促使人们对金融市场进行积极的参与。而且，一个充满活力的金融市场可以增加存款和投资的总量，并可以加速资金的有效分配，从而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另外，基于对众多的定量和对比研究，戈德史密斯也对金融关联度与经济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并得出了一个结论：随着经济发展程度的提高，金融相关率也随之提高。在此背景下，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并对其产生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 (2) 金融抑制理论

肖和麦金农提出了金融抑制理论，他们相信，不良的财政政策与财政体系将会严重地阻碍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造成“金融压抑”的根源在于：一是不科学的利率调控；由于利率管制，信用市场不能用利率来体现供求关系，并且，金融部门也只能制定出一个名称，通胀使得真实利率较高，而低利率压制储户的储蓄欲望，却让让更多人有了借贷的需要，从而造成了信用市场的供给失调。在这个时候，金融机关经常会把钱拨给那些经营稳定的国企来减少风险，而

大部分的民营企业要想解决自己的融资问题，就必须支付更高的借款费用来从私人银行中获得贷款，而城市的脆弱人群和乡村的低收入人群因为自己的天赋比较差，他们将会面对更加严重的融资困难，这一切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正常发展。第二，强迫性地介入货币交易。这些强制性的干涉所带来的最大结果就是导致了汇率的严重偏差，导致了一国人民币升值，从而对其出口额造成了负面的冲击，导致了一国对农产品和轻工业的忽视，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起到了阻碍作用。财务压抑说是财务发展学说的另一个重要的补充和改进。在一个国家，财政紧缩会对存款、贷款以及工作条件产生普遍负面的作用，并会最后引起内部产出的下降。要实现一个国家的高品质发展，必须克服“融资约束”，充分利用“市场化”的功能，推动“融资体制改革”。

### （3）金融深化论

以肖、麦金农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指出，发展中世界已经有了薄弱的市场机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以及高度依赖外资的问题，而财政部门的不理性控制将会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成长造成阻碍。他们认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推动金融的深入。金融深化对发达国家政府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需要削弱对利率和汇率水平的管制，让其充分地利用市场的功能，让其能够更好地体现出市场的调控效能，让其可以更好地体现出资本与外币的供需情况，进而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赞成“金融深化”理论的经济学家们不同意国家对金融发展进行过多的干涉，他们相信，一个以市场供需关系来确定的利率水平，将有助于银行系统吸纳储蓄和存款，这样就可以更好地解决社会各个部门的融资问题。健全的银行制度有利于发挥银行的“中间”功能，降低我国银行对外国资金的过分依赖性，从而有效地杜绝了银行间的“黑市”现象。而推动金融业开放，亦可为私人银行业提供一个良性、良性的成长空间，进而促进整体的经济发展。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金融发展的同时，国家对其进行全面的控制，它需要在一个相对合理、可控制的限度下，对其进行有效的监督，以减少由于缺乏监督造成的市场风险。适度的开放可以有效地指导资本的有效分配，推动经济的高品质发展，对我们国家的共同小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 （4）金融约束论

金融深化理论基于“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假定，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以及社会的伦理道德，使得开放过程中如果没有合适的国家介入，将会

阻碍到社会的发展。基于这一点，赫尔曼等人又进一步发展了融资限制的学说。这一理论提出，在宏观经济稳定，实际利率为正数，并且政府可以对市场失灵进行高效应对的情况下，财政部门可以采取合适的财政约束措施来促进储蓄和投资，并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在财政制约理论中，财政制约理论主张，国家在财政方面的政策体系和控制力不应该是固定的，应该在一定的基础上，结合国家的发展状况和财政的自由，做出相应的调整。

### 2.1.2 信贷配给理论

麦金农和肖都指出，在发展中世界，由于政府的介入，会导致信用分配问题。在1981年，斯蒂格里与韦斯通过对信用理论与金融理论的综合分析，得出结论：当一个固定的利率水平时，其利率并不能真实地反应出信用市场的供求状况，从而降低了存款方的存款需要，使得存款方的存款需要被抑制，借款方的要求很难得到解决，信用供给方的要求很难得到解决，信用供给方的要求也很高，因此，在信用供给方的要求上，银行往往会采用某些非利性的方式来解决放款方的要求，并且放款方的要求并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

信用配给使社会上的资金分配效率低下，使一些特定的人群很难得到贷款。在我国，信用配给问题的成因是信用配给问题。第一，贷款之前的不均匀性会引起一种“逆向选择”现象，由于借款人对于自身的风险状况以及贷款的目的都有着明确的认识，但是由于双方的信息不够透明，在一定的利息下，如果贷款的利息比贷款的利息要高，那么就有很大的概率会由于贷款的利息比贷款的利息要高，所以贷款之前的不均匀性会造成贷款的流入，而贷款之后，贷款的不均匀性就使得贷款的贷款流入了更多的贷款，而贷款之后，贷款的不均匀性又使得贷款的信用被排除在外。其次，在事中的不对称性会导致道德危险。在信用的要求下，信用的提供商在得到一笔贷款之后，不能追踪到贷款的去向，因此，借款的人常常会违反贷款的契约，冒险去进行具有较高危险性的投资，从而大大提高了他们的违约风险。第三，在此之后，由于不对称的原因，融资人需要支付一定的检查费用来验证借款人的真实身份。

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原因，银行机构更倾向于把自己的钱借给信息完整透明、信用质量高、拥有合格抵押品的大公司和高质量的顾客，而像是信息比较不完整

的人群，比如乡村居民、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则会比较难以获得信用服务，这就造成了他们所面对的金融排斥。

### 2.1.3 金融包容理论

在理论上，穆罕默德·尤努斯关于信用权利应该是一项基本权利，而非仅仅依靠信用就能缓解贫穷的观点，使得“信用普惠”概念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在实际的层次上，首先，从实质上来说，在风险是可以控制的前提下，以获取收益、稳健经营为目的，因此，为了降低费用和增加收益，银行通常不愿意为边远地区的人们和贫穷的人群提供金融服务，这就造成了弱势人群被排除在了金融体制的外面。但是，在这种环境下，金融包容可以让他们得到一个更加理性、更加正式的金融服务，从而提升他们的信用可得性，从而让他们的生存发展空间得到进一步的提升。第二，由于财政资金分配的不均衡，造成了贫穷和贫富差距，因此，财政普惠的目标是要在财政领域内，减少财政上的差别待遇，保证财政上的公正。

在“普惠”理念的倡导下，联合国于2005年首次将“普惠”理念引入到“普惠”领域，并将“普惠”理念与“普惠”理念相结合，以促进世界各国的良性发展。“金融包容”是指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并以此为切入点，以完善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银行信贷、信贷、租赁、保险等为重点，以缓解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银行信贷、信贷、租赁、保险等问题。而在更窄的范围内，所谓的“金融普惠”，就是诸如乡村人口这样易于“客体化”、“边缘化”的中低层人群，他们在这一制度下，将会得到更多的机会，更好地以更高的成本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源，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更加美好。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财政普惠已经不单单是“改善贫困人口对财政的利用”了，它还将使所有的社会阶级和团体都能够毫无限制地得到财政支持，不受歧视。数字普惠金融是金融包容性的具体表现，其主要目的是使每个国家都能享受到金融发展带来的好处，减轻贫困，消除收入差距，实现普惠。

### 2.1.4 创业减贫理论

#### （一）新 BOP 模式

Bottom of the Pyramid (又可写为“Base of the Pyramid”), 通常指的是价格低廉, 收入不高的人群, 或者是贫困人群。另一些人称之为基层企业家的模型和理念。近年来, BOP 理论与新的 BOP 模型相结合, 新的 BOP 模型与原有的 BOP 模型的不同之处就是引入了数字化技术、数字化平台等, 从而极大地影响了模型的运行机理。Prahalad 和 Hammond (2002) 指出, 走在最前面的跨国公司忽略了大约占世界人口总量 70% 的 40 亿贫穷客户的需要, 他们提出 BOP 降低贫困的核心思想是: 由大型企业开发具有高性价比、底层消费者喜闻乐见的产品, 从而对 BOP 阶级的生活品质 (降低贫困) 进行提升, 同时还可以实现大型企业在经济意义上的商业收益 (不同于社会性质的慈善)。BOP 是一中穷人通过降低消费和节约来实现脱贫的一种方法 (London et al., 2014)。另一些学者则提出, BOP 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对大规模的公司进行产品创新, 寻找新的市场空间的一种公司的内在的企业家精神 (Seelos and Mair, 2007; 万倩雯等, 2019), 促进了公司以产品和业务方式为弱势群体提供更多的帮助 (Bruton et al., 2013)。邢小强等 (2011) 认为, 中国存在着“价值链”缺位和“体制空白”, 因此, 构建跨行业的互动网势在必行, 而地方的互动则成为了互动的重要因素。数字化技术促进了 BOP 企业的发展, 促进了 BOP 企业的发展 (邢小强等, 2019)。

## (二) 资源补给理论

资源补给理论指出, 企业在获得了直接的资源补充后, 能够实现脱贫 (Sutter et al., 2019)。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就是贫穷是由于缺少资金或者其它有形财产而引起的。所以, 为有创业需要的贫困者发放低息贷款, 支持他们创业, 既能增加他们自己和家庭的收入, 也能对他们的非经济表现, 尤其是创业家庭的教育水平, 起到正面的作用。资源补给予理论认为, 在贫穷地区, 创业导向资源、社会资源、知识资源、政治稳定资源、物质资本等是影响创业行为发生的主要因素 (West III et al., 2008; Ahlin and Jiang, 2008)。在西方, 人们普遍认为, 提供更多的土地、劳动力、教育和基础设施等资源, 就会有更少的贫困 (Fallon and Lucas, 2002; Leff, 1979; Romer, 1986)。在这一视角下, 许多西方学者认为, 国外的直接资金支持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的一种有效途径 (West III et al., 2008; Alvarez et al., 2015)。小额信贷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资源补给理论。

## (三) 本土创业理论

本土创业是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学者们从多个角度探讨了本地企业家与扶贫的关系。“本地化”创业与“外来创业者”帮扶贫困者的“BOP”模式不同，是一种当地贫困者以自己的方式实现脱贫的方式，与其所处的地域文化具有较强的一致性，该模式在浙江义乌和东阳非常流行，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也有一定的应用。本地创业是一种以本地人为主体、以本地人为主体、以本地人为主体的自主创业（Dana, 2007）。“本地穷人”往往具有本地特有的文化和团体准则，在全球范围内，由于缺少与经济发展同步的机遇而造成了“本地穷人”的贫穷（Peredo et al., 2004）。近年来，许多当地的穷人开始尝试用当地的创业来改善当地的贫穷状况，从而促进当地和周边的经济发展（Peredo and McLean, 2013; Peredo et al., 2004）。

## 2.2 研究假设

通过上述理论，金融结构的完善、适当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约束有助于推动地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而金融结构完善的过程会遇到诸多问题：金融本身所具有的金融排斥阻碍了金融服务于弱势群体；监管层要通过金融政策和金融制度来处理市场中的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等问题，但金融制度和政策有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信贷配给现象，导致金融排斥现象更加严重。

数字普惠金融借助其数字技术激励了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创新，对金融结构的成熟起到促进作用。在微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降低金融服务成本，便利居民消费，促进经济增长；在宏观方面，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降低金融抑制，促进金融资源合理配置，减少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金融服务更加包容地服务于低收入群体和中小企业，从而减少贫困和收入不均。

基于此，提出假设 1：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起到正向促进作用。

新 BOP 理论、资源补给理论和本土创业理论等创业减贫理论，证明了创业的减贫效应。创业活动有利于扩大就业和改善民生，从而推动共同富裕。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信贷约束、降低信息约束等途径为创业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利用数字化技术，金融机构可以全面便捷的对客户进行风险评估，激励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提供金融服务；从创业者的角度出发，数字普惠金融更加高

效便捷的融资渠道缓解了创业者的融资压力，提高创业的成功率，其次数字普惠金融本身就是新兴产物，其自身也提供了众多的创业机会。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假设 2：创业活跃度是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中介变量。

### 3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现状分析

#### 3.1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数字普惠金融以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为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限制普惠金融的创新发展。因此本节针对甘肃省从普惠金融和数字基础设施两方面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 3.1.1 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2014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印发《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4-2018）》的通知，通知强调要构建更具包容性与竞争性的金融服务体系，扩大各种金融服务的覆盖面，提高金融服务的渗透率，更好地满足农村地区与贫困地区的金融需求，让社会各个阶层与群体都能够享受便捷、安全的金融服务。

甘肃省在这一指导下，农村金融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其对农村经济的支撑，已逐渐变成了促进农业生产、促进农户收入增长的有力手段。为促进甘肃省普惠金融于全省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农商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为代表的“三农”领域，在全省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等多个地区，纷纷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多项创新性的金融业务。普惠性融资可以为贫困区域中的低收入者带来最基本的融资信用，进而为其在资金获取方面推动乡村经济发展带来机遇与可能。

普惠性金融为小微企业提供了更多的支持，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也引起了业界广泛的重视。甘肃省近几年出台了一系列利用普惠金融支持小微经济发展的措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自2015起，中国央行兰州分行与地方金融机构合作开展了小额信贷合作，采取“中小企业信用合作+国家信用保证”的方式，省级和省级共同承担了约10亿元的小额信贷，已发放了138亿元的小额信贷，惠及了3700余户小额信贷。在甘肃政府的牵头下，全省各大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开展了一系列的金融改革，先后发布了包括“税易贷”、“银税通”在内的22项银税合作创新业务，为2万余户小微型经济提供了超过1100余万元的信贷服务。在2018年年初，为推进小微企业“双创”融资改革，共同出台了《甘肃省

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在 2017 年底，试图将应付账款做为解决企业资金难题的突破口，联合发起了小微企业应收款项融资三年专项行动，同时，还对供应链金融进行了主动的指导，推动国有企业、大型民营企业等供应链核心企业，推动其通过应付款项融资来帮助上下游小微企业解决资金问题，最终，对 2000 多家中小微企业进行了应收款项融资 800 多亿元的工作。<sup>①</sup>

不仅如此，由于省内各方面发展状况与其他省份的差异，全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甘肃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困难约束条件制约下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创新体制机制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根据甘肃省统计局官网数据，2020 年甘肃省实现了预期发展目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万亿元，经核算具体为 10243.3 亿元，增长率达到 6.9%。其中，第一产业反映了农村发展整体状况和乡村振兴成果，2021 年甘肃省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1364.7 亿元，较 2020 年增长 10.1%。从农村居民的实际物质富裕程度来看，2021 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1433 元，比 2020 年增长 10.5%，两年平均增长 9.0%，符合预期增长速度要求。这些经济增长成果的取得，金融支持以及普惠金融的大力落实起到了很好的保障作用。

2020 年底全省加快在农村地区开展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新设立银行机构服务网点 3953 个，各类金融机构大力建设助农金融服务网点，累计达 2.53 万个。为保证广大农村地区移动支付功能的全覆盖，全省农村地区累计新开银行卡 8000 余万张，人均持卡数接近 5 张。但从另一方面看，甘肃省仍存在诸多关键因素和问题制约了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尤其是针对经济社会弱势群体和薄弱产业的金融服务质量和数量难以得到保证。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普惠金融对于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重点服务对象的可获得性。同时，省内农村地区的金融支付、保险、投资、信贷和信用等各类业务都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广大农村居民在获取多样化金融服务时，其便利性和及时性受到一定的制约，并且在获得性上好存在一定的门槛效应。

甘肃省地理条件复杂多样，因此出产的绝大部分农产品对存储的要求比较高，并且质量也是参差不齐，这也加剧了农业本身在获取金融支持和金融资源上的排斥性和抑制性。依据发展经济学家麦金农、肖等人所提出的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

<sup>①</sup> 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官网。

排斥理论来分析，与城镇地区以及工业相比，处于弱勢的农村地区及农业对于金融服务、金融产品的需求体量明显要小，再加上发展的落后，导致金融服务体系在地理和区域上存在覆盖盲区。甘肃省农村地区整体教育水平落后于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较低，金融素养较低，对金融产品的理解能力有限，对金融知识的学习不足，并且对于智能手机、电脑等现代网络信息传输设备的掌握度不够，进一步导致农村弱势群体被边缘化，可获得的金融服务也就越少，受到较严重的金融排斥。

中国央行 2021 年 1 月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到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止，甘肃省共有 274 个微型信贷公司，员工 2620 名，注册资金 145.56 万元，贷款额 122.14 亿元。尽管甘肃省的微型金融公司数目与地方政府核准成立的数据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是总体而言，其微型金融发展的许多指数与整个西北乃至国内相比，都是偏弱甚至偏弱的。

### 2.1.2 甘肃省数字基础设施发展现状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需要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撑。如表 3-1 所示，甘肃省电信业务量近十年的增长情况，反映了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移动电话用户期末数从 2011 年的 1614 万增长到 2673.83 万，增长率 65.66%，人均持有量已经超过 1 部。但从移动网络用户数据来看，2011 年只占移动电话用户数的 9.46%，说明此时大部分人使用移动电话只满足其打电话发短信的基本沟通交流功能，至 2018 年，移动网络用户占比已经超过 80%。2020 年移动电话用户数的下降一方面可能与疫情相关，工作量的减少使得人们主动减少移动电话持有量，但人均持有量仍在一部以上；另一方面 2020 年甘肃省人口的净流出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于 2020 年底 3G 和 4G 移动网络用户占比的下降应归因于 5G 网络的发展与普及。2020 年中国累计建成 5G 基站 70 多万个，5G 终端连接数超过 2 亿。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一直保持稳定增长，为数字化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表 3-1 2011-2020 年甘肃省电信业务量

年份	移动电话用户 期末数(万户)	3G 移动电话 用户(万户)	4G 移动电话 用户(万户)	3G 和 4G 移动网 络用户比 (%)	互联网宽带接 入用户(万户)
2011	1614.00	152.70		9.46	145.63
2012	1764.00	308.70		17.50	163.30
2013	1976.00	608.90		30.81	192.15
2014	2059.00	835.80	126.00	46.71	213.90
2015	2108.10	454.60	726.70	56.04	245.34
2016	2203.84	334.60	1332.50	75.65	392.86
2017	2526.41	248.50	1744.50	78.89	576.40
2018	2736.00	280.27	2000.95	83.38	742.84
2019	2751.17	189.76	2205.43	87.06	870.69
2020	2673.83	49.60	2175.38	83.21	931.42

资料来源：甘肃省统计局官方网站。

## 3.2 甘肃省共同富裕相关因子现状

共同富裕是一个综合性指标，覆盖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影响因素众多。学者们从发展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三个方面考察共同富裕程度，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地区生产总值、恩格尔系数、社会保障、科研投入等都是主要衡量指标。

### 3.2.1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如表 3-2 所示，甘肃省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稳定增长，从 2011 年至 2020 年均实现翻倍，但与全国平均水平差距较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十年来一直略高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此维度来看甘肃省整体居民的富裕程度要落后于全国水平。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011 年-2020 年十年增长 2.65 倍，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镇相比，仅仅不到三分之一，城镇与农村的收入差距明显。

表 3-2 2011-2020 年甘肃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2011	14989	3909	14551
2012	17157	4507	16510
2013	18965	5108	18311
2014	20804	5736	20167
2015	23767	6936	21966
2016	25693	7457	23821
2017	27763	8076	25974
2018	29957	8804	28228
2019	32323	9629	30733
2020	33822	10344	32189

资料来源：甘肃省统计局及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 3.2.2 地区生产总值

地区生产总值是一个能够很好地从整体评价某一地区富裕程度的指标。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长期稳定增长，2020年增速趋缓，这与国内大环境相符。从经济总量来看甘肃省处于国内落后水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也是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由此可见，甘肃省富裕程度较低，可持续性较弱，经济发展质量仍有较大潜力，应充分利用已有各方支持，并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寻求稳健的经济增长点。

表 3-3 2022-2020 年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

年份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甘肃省生产总值 占全国比例 (%)	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 (元)	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 (元)
2011	4816.94	1.06	18846	36277
2012	5393.12	1.09	21141	39771
2013	6014.53	1.10	23647	43497
2014	6518.39	1.07	25724	46912
2015	6556.55	1.00	25946	49922

续表 3-3 2012-2020 年甘肃省地区生产总值

年份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甘肃省生产总值 占全国比例 (%)	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 (元)	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 (元)
2016	6907.91	0.97	27396	53783
2017	7336.74	0.90	29103	59592
2018	8104.07	0.92	32178	65534
2019	8718.30	0.88	34707	70078
2020	9016.70	0.89	35995	71828

资料来源：甘肃省统计局及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 3.2.3 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是衡量居民消费结构的指标，如表 3-4 所示甘肃省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于全国总体水平接近，2020 年低于全国 1.5%，可能由于全国公共事件的发生导致居民消费结构发生改变。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始终高于城镇居民，同样也高于全国居民总体水平。农村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比高，归因于可支配收入低，食品支出又是生活必要支出，从而系数较高。

表 3-4 2011-2020 年甘肃省居民恩格尔系数

年份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 (%)	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 (%)	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 (%)
2011	32.83	39.66	33.6
2012	31.06	37.13	33.0
2013	31.04	34.47	31.2
2014	31.14	34.91	31.0
2015	30.63	32.86	30.6
2016	29.57	31.29	30.1
2017	29.20	30.36	29.3
2018	28.71	29.73	28.4
2019	28.60	29.20	28.2
2020	28.72	30.89	30.2

资料来源：甘肃省统计局及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 3.2.4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是地区对于民生的保障，能够起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作用，体现了地区发展的共享性。如表 3-5 所示，甘肃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均连年增长，但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比呈现下降趋势。财政支出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合理分配，从此单一数据来看，甘肃省的社会保障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表 3-5 2011 年-2020 年甘肃省财政支出

年份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万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万元）	占比（%）
2011	17912432	2792219	15.59
2012	20595638	2946396	14.31
2013	23096230	3467666	15.01
2014	25414935	3762231	14.80
2015	29583117	4213133	14.24
2016	31500340	4648042	14.76
2017	33044417	4681628	14.17
2018	37722330	5047657	13.38
2019	39515991	5291398	13.39
2020	41633990	5809456	13.95

资料来源：甘肃省统计局官方网站。

### 3.2.5 科研投入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也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核心竞争力，科研投入的高低是对于科技创新重视程度的体现，科研经费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科技的创新，反映了地区发展的可持续性。甘肃省 2011-2020 年在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的投入逐年增加，2019 年突破 100 亿，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呈现上升趋势。

表 3-6 2011-2020 年甘肃省 R&amp;D 经费内部支出

年份	R&D 经费内部支出（万元）	R&D 经费内部支出相当于生产总值比例（%）
2011	485261	0.97
2012	604762	1.07
2013	669194	1.06
2014	768739	1.12
2015	827203	1.22
2016	869850	1.22
2017	884070	1.19
2018	970537	1.18
2019	1102446	1.26
2020	1096444	1.22

资料来源：甘肃省统计局官方网站。

综上各指标分析，甘肃省 2011 年至 2020 年各方面维持稳定发展，富裕程度、社会保障与科技发展都取得绝对进步。但与全国相比，无论是富裕程度、社会保障所体现的共享性还是科研投入所反映的可持续性都处于落后水平，增长速度偏缓，长期来看势必会扩大与其他相对富裕地区的差距。

## 4 变量选取及描述性统计

### 4.1 变量的测度与说明

#### 4.1.1 共同富裕指数的测度

在“共同富裕”的内涵中，“富裕”是指人们对财富的占有，它代表着一种社会生产力的发达程度；“共同”是指人们在财产上所拥有的一种形式，它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刘培林等（2021）将“国家强大，民众共富”作为政治内涵，将“人们创造并分享不断增长的物质与精神财富”作为经济内涵，将“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要群体的和谐与稳定的社会”作为社会内涵，并以“整体富裕水平”与“发展成果分享水平”作为共同富裕的评价标准，从整体富裕和发展结果分享水平两个方面，分别建立了“国家强大、人民共富”的评价指标体系。万海远、陈基平（2021）还认为，发展与共享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定量基础，可用人均国民收入衡量发展水平，用基尼系数衡量社会共享程度，但也指出，共同富裕与财富分配并非相互取代、相互补充，而且随着整体富裕程度的提升，共同富裕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

本文以钞小静、任保平（2022）、韩亮亮（2022）为参照，以甘肃省地级市层面的数据为依据，从“发展性”、“共享性”、“可持续”三个层面，分别建立3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17个三级指标。在三级指标的选取上考虑到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数据的代表性和可得性最终确定17个三级指标，如表4-1所示。在此基础上，运用熵值法对各地区以上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了各地区的共同富裕指数，记为Cmp。在稳健性检验方面，我们采用了主成份分析的方法，对我国的共同富裕指标进行了重新计算，并对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表 4-1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发展性	富裕度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
		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
		恩格尔系数	-

续表 4-1 共同富裕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属性
发展性	共同度	基尼系数	-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
		城镇化率 (%)	+
共享性	文化教育	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占比 (%)	+
	医疗健康	每万人口拥有执业医师数 (人)	+
		每万人医疗机构床位数 (张)	+
	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支出占 GDP 比重 (%)	+
	基础设施	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数量 (辆)	+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平方米)	+
可持续性	科技创新	R&D 投入强度 (%)	+
		每万人专利授权件数	+
	生态环境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
		碳排放强度 (kg/万元)	-
	发展质量	人均 GDP (元)	+

#### 4.1.2 共同富裕指数测度结果分析

运用熵值法对共同富裕各项指标进行加权，详细结果见附录 1。结果显示 2011-2020 年甘肃省各地级市共同富裕指数稳定增长，呈现上升趋势。2011 年甘肃省各地级市共同富裕指数均值为 0.1975，2015 年共同富裕指数均值为 0.2852，2020 年共同富裕指数均值为 0.4100，与 2011 年相比增长 107.6%。表 4-2 是甘肃省 2011 年、2015 年和 2019 年各地级市共同富裕指数的排名情况，其中嘉峪关市、兰州市、金昌市始终排名前三位，而陇南市一直排名倒数第一。其他各市排名出现波动，但波动范围不大。

表 4-2 2011、2015、2020 年甘肃省各地级市共同富裕指数排名

排名	地级市			排名	地级市		
	2011 年	2015 年	2020 年		2011 年	2015 年	2020 年

续表 4-2 2011、2015、2020 年甘肃省各地级市共同富裕指数排名

1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	嘉峪关市	7	武威市	武威市	白银市
2	兰州市	兰州市	兰州市	8	天水市	天水市	天水市
3	金昌市	金昌市	金昌市	9	庆阳市	平凉市	平凉市
4	酒泉市	酒泉市	张掖市	10	平凉市	定西市	庆阳市
5	张掖市	张掖市	酒泉市	11	定西市	庆阳市	定西市
6	白银市	白银市	武威市	12	陇南市	陇南市	陇南市

### 4.1.3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本文选取北京大学编制发布的 2011-2020 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衡量甘肃省各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记为  $Difi$ 。为了使回归系数更具可比性也更有分析价值，对原始指数进行均除 100 统一量纲处理。同时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包括三个一级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分别进行分析和检验，分别记为 CS、UD 和 DD。从表 4-3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来看，其均值由 2011 年的 0.4066 增长到 2020 年的 2.4132，增长接近 6 倍。同时甘肃省各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差距不断缩小，倍差值由 2011 年的 3.41 下降到 2020 年的 1.26。

表 4-3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

年份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2011	0.4066	0.1953	0.6656
2012	0.7912	0.5552	1.0906
2013	1.1659	0.9315	1.7113
2014	1.4123	1.0561	1.9487
2015	1.6075	1.4096	1.9377
2016	1.8084	1.6214	2.1190
2017	2.0950	1.8791	2.4161
2018	2.1727	1.9520	2.5079
2019	2.2965	2.0804	2.6464
2020	2.4132	2.1967	2.7707

#### 4.1.4 创业活跃度

现有甘肃省统计年鉴未列出各地级市民营企业家人数、民营企业户数以及民营企业 and 个体户的经营规模。并且，创业企业与个体工商户规模较小，大多是个人独资或多人合伙形式，故本文借鉴翟仁祥、宣昌勇（2022）的衡量思路，利用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员之和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地级市的创业活跃度：

$$Epa_{it} = \frac{Qua_{it}}{Pop_{it}} \quad (1)$$

公式（1）中，i 和 t 分表表示各地级市和年份，Epa<sub>it</sub> 代表 i 市 t 年创业活跃度，Qua<sub>it</sub> 代表 i 市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总人数，Pop<sub>it</sub> 代表 i 市总人口数。

表 4-4 报告了 2011、2015 和 2020 年创业活跃度的测度结果，2011 年与 2015 年兰州市、嘉峪关市和金昌市持续位于前三名，创业活跃度明显高于其他地级市。2020 年白银市创业活跃度飞速上涨，超过兰州市、嘉峪关市、金昌市等排名一直靠前的地级市，名列甘肃省第一。陇南市创业活跃度持续较低，甚至在测度指标上出现下滑趋势。

表 4-4 创业活跃度测度结果

城市	2011 年	2015 年	2020 年
兰州市	0.1528	0.1880	0.3134
嘉峪关市	0.1157	0.1793	0.2793
金昌市	0.1209	0.2065	0.3306
白银市	0.0353	0.0332	0.4239
天水市	0.0380	0.0444	0.0747
武威市	0.0784	0.1359	0.1329
张掖市	0.0635	0.0823	0.0822
平凉市	0.0496	0.1088	0.1394
酒泉市	0.0596	0.0964	0.1621
庆阳市	0.0348	0.0585	0.0690
定西市	0.0488	0.1277	0.0810
陇南市	0.0225	0.0175	0.0149

### 4.1.5 控制变量

除数字普惠金融外，还有诸多变量会对共同富裕水平产生影响。本文控制变量主要选取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GDP）、产业结构（IS）、政府干预（GI）、教育发展（Ed1）、对外开放水平（OL）。

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地区生产总值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更容易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人民的相对富裕程度越高。

产业结构（IS），本文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来衡量产业结构。随着经济的增长，服务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产业发展向高效率转变。

政府干预（GI），本文采用公共财政支出来衡量政府干预水平。财政支出以公共服务为主，支出越高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保障民生。

教育发展（Ed1），本文采用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例来衡量教育发展水平。教育发展水平越高一方面受教育程度越高，人民综合素质提高，减少社会恶性事件；另一方面更能够抓住市场发展机会，做出更加合理的分析与判断。

对外开放水平（OL），本文采用进出口商品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进行衡量。进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一个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占比高说明对外开放程度越高。

## 4.2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 4.2.1 数据来源

由于甘肃省下辖两个自治州的数据存在明显的缺失，故剔除临夏州和甘南州两个自治州。本文以 2011-2020 年甘肃省 12 个地级市作为样本，对其平衡面板数据进行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其他数据来自《甘肃发展年鉴》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样本中存在缺失数据的情况，采用线性插值法对其进行补充。

表 4-5 变量的含义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计算方法
被解释变量	共同富裕指数	Cmp	上述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合成
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ifi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100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	CS	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一级维度指数/100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	UD	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一级维度指数/100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	DD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一级维度指数/100
中介变量	创业活跃度	Epa	私营和个体就业人员/地区总人口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GDP	地区生产总值
	产业结构	IS	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政府干预	GI	公共财政支出
	教育发展水平	Ed1	财政教育支出/公共财政支出
	对外开放水平	OL	进出口商品总值/地区生产总值

#### 4.2.2 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 4-6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Variables	N	mean	sd	min	max
被解释变量	Cmp	120	0.300	0.151	0.0560	0.679
解释变量	Difi	120	1.617	0.666	0.195	2.771
	CS	120	1.557	0.707	0.0188	2.927
	UD	120	1.412	0.661	0.166	2.475
	DD	120	2.186	0.783	0.0339	5.812
中介变量	Epa	120	0.112	0.0805	0.0146	0.424
控制变量	GDP	120	0.559	0.537	0.153	2.887
	IS	120	1.363	0.827	0.204	4.107
	GI	120	0.169	0.098	0.017	0.486
	Ed1	120	0.176	0.0307	0.0357	0.265

续表 4-6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Variables	N	mean	sd	min	max
控制变量	OL	120	0.083	0.181	0.002	1.214

表 4-6 报告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4-7 报告了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Pearson 检验和 Spearman 检验显示的结果基本类似，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一级子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均与共同富裕显著正相关，这也初步支持了假设 1：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中介变量创业活跃度与共同富裕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一级子维度均显著正相关。同时，解释变量与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较小，故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4-7 变量相关性检验

变量	cmp	epa	difi	cs	ud	dd	is	edl	gdp	gi	ol
cmp	1.0000	0.7709***	0.7042***	0.7342***	0.6449***	0.4762***	-0.0650	-0.5202***	0.1234	-0.1156	0.5281***
epa	0.7789***	1.0000	0.4891***	0.5192***	0.4621***	0.2764***	-0.1495	-0.3866***	0.0085	-0.1607*	0.4587***
difi	0.6526***	0.5158***	1.0000	0.9853***	0.9589***	0.7780***	0.3549***	-0.2179**	0.3353***	0.3487***	0.1108
cs	0.6951***	0.5583***	0.9847***	1.0000	0.9329***	0.7342***	0.3487***	-0.2242**	0.3735***	0.3415***	0.1280
ud	0.5796***	0.4641***	0.9536***	0.9241***	1.0000	0.7064***	0.3633***	-0.1563*	0.3132***	0.3568***	0.1021
dd	0.4360***	0.3088***	0.8074***	0.7271***	0.6753***	1.0000	0.2846***	-0.1014	0.2167**	0.3364***	0.0862
is	-0.1052	-0.1906**	0.3743***	0.3453***	0.4017***	0.3030***	1.0000	0.2956***	0.1941**	0.6841***	-0.3367***
edl	-0.4893***	-0.3264***	-0.1757**	-0.1979**	-0.1242**	-0.1340**	0.2538***	1.0000	0.2827***	0.4796***	-0.1422
gdp	0.3065***	0.3430***	0.2793***	0.3305***	0.2426***	0.0964**	0.1236**	0.1220**	1.0000	0.6667***	-0.0494
gi	-0.0838	-0.0184	0.3762***	0.3676***	0.3927***	0.2601***	0.5696***	0.3620***	0.7267***	1.0000	-0.2666***
ol	0.3507***	0.3290***	-0.0693**	-0.0384*	-0.0841**	-0.1172**	-0.3774***	-0.3117***	-0.0767**	-0.3467***	1.0000

注：左下为 Pearson 相关性检验结果，右上为 Spearman 相关性检验结果，\*\*\*、\*\*、\*代表在 1%、5%和 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 5 实证设计和结果检验

### 5.1 基准回归模型

#### 5.1.1 模型构建

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构建如下面板回归模型：

$$Cmp_{it} = \lambda_0 + \lambda_1 Difi_{it} + \sum \lambda_i Con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2)中， $Cmp_{it}$ 为地级市*i*在*t*年份的共同富裕指数； $Difi_{it}$ 为地级市*i*在*t*年份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Con_{it}$ 表示一系列可能对共同富裕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GDP)、产业结构(IS)、政府干预(GI)、教育发展(Ed1)、对外开放水平(OL)； $\mu_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 $\delta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 $\lambda_1$ 为待估计参数，预期系数显著为正。

#### 5.1.2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 (1) 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回归结果

本文使用Stata16.0软件，运用Hausman检验后显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故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表5-1报告了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回归结果，在列(1)中未加入经济发展水平(GDP)、产业结构(IS)、政府干预(GI)、教育发展(Ed1)、对外开放水平(OL)等控制变量时，回归系数为0.104。列(2)为加入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为0.092，显著为正。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数字普惠金融都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与上文理论分析结果一致。

数字普惠金融依托其自身“数字性”和“普惠性”被广为接纳和使用，有效的降低了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排斥。数字性以互联网基础设施为载体，一方面使得信息传递效率提高，用户可以实时了解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观测金融市场的各种信息，包括利率水平、汇率水平，减少了频繁前往金融机构的“鞋底成本”，更好地匹配到所需要的金融服务。金融机构利用数字化技术，将金融服务更好的进

行标准化，同时联合政府搭建信息化平台，完善用户的信用信息，降低供给方与需求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做到金融服务的精准供给。另一方面数字化提高了金融服务的便利性。随着数字化的发展，金融机构的运营方式转换为线上与线下同步进行，开发出各种金融服务 APP，足不出户就可以办理开户、转账、存贷款等基础金融服务，随时随地购买保险、基金、办理信用卡，降低了实体网点的需求量，也摆脱了实体网点的限制，有效的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拓宽了服务群体的地域范围。普惠性一部分来源于数字性，由于数字性降低了服务成本、交易成本、摩擦性成本的同时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获取金融服务的渠道。普惠性使得边缘群体以更加惠民的方式获取各种金融服务，为人们从事生产活动、扩大经营规模、提高经济收入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数字普惠金融对“金融服务”这一商品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更多的人享受到金融工具为其带来的便利，使得金融供给更大程度上弥合金融需求，促进了人们进行生产经营的动力。

数字普惠金融使人们获得与之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企业和个人可及时准确利用金融工具对冲市场风险，提高抗风险能力，减少风险发生带来的亏损，达到增收的效果，从而提高居民的富裕程度；数字普惠金融的便利性在一定程度上盘活了居民的闲散资金，使未流通的货币参与市场流通，提高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效率，同时居民更好的选择适合自己的理财产品，智能投顾等服务助力用户提高投资收入；数字普惠金融让广泛群体拥有获取金融资源的机会，这本身就体现了共同富裕中“共同”的内涵。

表 5-1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difi	0.104*** (0.004)	0.092*** (0.006)
is		0.020*** (0.007)
edl		-0.196** (0.092)
gdp		0.044***

续表 5-1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0.016)
gi		-0.131 (0.096)
ol		-0.061** (0.025)
_cons	0.289*** (0.008)	0.270*** (0.019)
R-squared	0.986	0.989
F-test	452.411	698.315
N	120	120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 (2) 数字普惠金融一级子维度与共同富裕的回归结果

表 5-2 报告了数字普惠金融一级子维度与共同富裕的回归结果，列（1）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对共同富裕有促进作用，回归系数为 0.085，显著为正。随着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的提升，被金融服务边缘化的群体摆脱了地理位置的限制，居民可以随时随地获得金融服务来改善生产经营状态。列（2）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与共同富裕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 0.084。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不断深化，数字化金融产品也不断完善，从基础的移动支付服务扩展到货币基金服务，尤其是信用和信贷业务及时为小微和个体从业人员提供资金支持，激励自由职业者和农民进行创业活动，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共同富裕。列（3）表示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与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 0.027。数字化程度越高，金融服务与交易的效率就越高，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专心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增加经济产出，促进共同富裕。

表 5-2 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一级子维度与共同富裕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CS	0.085*** (0.006)		
UD		0.084*** (0.011)	
DD			0.027** (0.013)
is	0.019*** (0.007)	0.025*** (0.008)	0.035*** (0.011)
edl	-0.226** (0.095)	-0.170* (0.093)	0.047 (0.160)
gdp	0.040** (0.017)	0.013 (0.018)	-0.007 (0.025)
gi	-0.082 (0.104)	0.089 (0.111)	0.427*** (0.147)
ol	-0.074*** (0.022)	-0.079*** (0.029)	-0.147*** (0.031)
_cons	0.270*** (0.021)	0.288*** (0.023)	0.242*** (0.045)
R-squared	0.989	0.985	0.971
F-test	583.473	440.827	178.572
N	120	120	120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 5.1.3 稳健性检验

#### (1) 内生性问题

前文的研究肯定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正向促进作用,但研究结果可能有一定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是反向因果问题,居民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等

共同富裕指标的提升可能反向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即居民收入增加，投资意愿增加，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城镇化率的提高也可能促进当地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另一方面是遗漏变量问题，尽管本文控制了可能对共同富裕产生影响的变量，但仍无法避免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造成的估计结果偏误。为此，本文运用工具变量法，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来缓解上述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借鉴钱刘心怡等（2022）的研究思路，考虑到邮局对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的影响深远，互联网的发展起源于电话的普及以及邮电业务的发展，邮政局（所）数量（po）反映了当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且这一历史因素与现阶段居民的个体特征及宏观经济发展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较弱，理论上满足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高度相关以及与被解释变量不相关的要求。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是跨期变化的，结合田瑶等（2022）的计算方法，计算样本中除本城市外其他所有城市在相应时间节点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均值（mdifi），并将其与地区 2004 年的邮政局（所）数量相乘（po\*mdifi），这一指标具备时间变化效应，由于量纲原因，再进行同除 100 处理，以此作为工具变量（iv），采用 2s1s 法进行估计。结果显示，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为 4.959，P 值为 0.026；Hansen J 统计量 P 值为 0，工具变量不存在不可识别和过度识别问题；第一阶段结果显示工具变量（iv）与内生解释变量（Difi）的回归系数为 1.3915，在 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且 F 统计量为 50.71，说明工具变量不是弱工具变量。由此可见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合理。表 5-3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回归系数为 0.109，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与上文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表 5-3 工具变量法

cmp	Coef.
difi	0.109*** (0.011)
is	0.035*** (0.007)
ed1	-1.004*** (0.322)

续表 5-3 工具变量法

cmp	Coef.
	0.214***
	(0.019)
gdp	
	-1.215***
	(0.175)
gi	
	0.146***
	(0.042)
ol	
	0.326***
	(0.062)
_cons	
N	120
R-squared	0.834
时间效应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 (2)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使用以下三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上文使用熵值法对共同富裕指数进行合成，此方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可能与客观经济事实相矛盾，故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合成共同富裕指数并进行回归。首先进行 KMO 和 Bartlett 检验，结果显示 KMO 值为 0.875 适合做主成分分析；Bartlett 检验 P 值为 0，显著小于 0.05，可以做主成分分析。详细计算结果请见附录 2。如表 5-4 列(1)结果显示，回归系数为 0.338，显著为正。回归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改变。

第二，缩尾处理。考虑到异常值可能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故对解释变量进行前后 1%的缩尾处理。表 5-4 列(2)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回归系数为 0.093，显著为正。

第三，增加控制变量。增加地区金融发展水平 (Fd1) 和人口结构 (CS) 两个控制变量，再次对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进行回归。金融发展水平以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之和来计算，人口结构以 15-65 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表

5-4 列 (3) 报告了增加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 数字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仍与前述结果一致。

表 5-4 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的稳健性检验

cmp	主成分分析法 (1)	缩尾处理 (2)	增加控制变量 (3)
difi	0.338*** (0.048)	0.093*** (0.006)	0.092*** (0.006)
is	0.047* (0.028)	0.020*** (0.007)	0.020*** (0.008)
edl	0.347 (0.357)	-0.190** (0.090)	-0.187* (0.097)
gdp	0.194** (0.087)	0.044*** (0.016)	0.057** (0.022)
gi	-1.160** (0.583)	-0.131 (0.095)	-0.124 (0.101)
ol	-0.033 (0.173)	-0.060** (0.025)	-0.062** (0.025)
fdl			-0.001 (0.002)
ds			0.017 (0.051)
_cons	-0.089 (0.090)	0.269*** (0.019)	0.248*** (0.051)
R-squared	0.987	0.989	0.989
F-test	605.871	707.960	733.702
N	120	120	120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 5.2 中介效应模型

### 5.2.1 模型构建

借鉴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相关研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Cmp_{it} = \lambda_0 + \lambda_1 Difi_{it} + \sum \lambda_i Con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 1_{it} \quad (3)$$

$$Epa_{it} = \alpha_0 + \alpha_1 Difi_{it} + \sum \alpha_i Con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 2_{it} \quad (4)$$

$$Cmp_{it} = \gamma_0 + \gamma_1 Difi_{it} + \gamma_2 Epa_{it} + \sum \gamma_i Con_{it} + \mu_i + \delta_t + \varepsilon 3_{it} \quad (5)$$

其中， $Epa_{it}$ 为中介变量， $\varepsilon 1_{it}$ 、 $\varepsilon 2_{it}$ 、 $\varepsilon 3_{it}$ 分别表示各个模型的随机扰动项。其余变量含义同上文。 $\lambda_1$ 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影响的总效应， $\gamma_1$ 表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影响的直接效应， $\alpha_1 \times \gamma_2$ 表示中介效应。在 $\lambda_1$ 、 $\alpha_1$ 和 $\gamma_2$ 都显著的情况下，若 $\gamma_1$ 显著，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若 $\gamma_1$ 不显著，则表示为完全中介效应。

### 5.2.2 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分析

表 5-6 报告了创业活跃度作为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列（1）表示公式（3）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估计系数为 0.161，显著为正；列（2）表示公式（4）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活跃度的回归结果，估计系数为 0.073 显著为正；列（3）表示公式（5）数字普惠金融和创业活跃度的回归结果，回归系数分别为 0.137、0.331，均显著为正。结合表 5-6 的回归结果，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总效应为 0.161，创业活跃度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其中介效应为 0.024，占总效应的 15.05%。

结果表明，随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刺激了居民的自主创业，居民可获得源源不断的经济收入，提高富裕程度的同时缩小了与其他发达地区的差距。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一方面进一步支持政府进行招商引资，加速地区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有利于政府进行公共基础事业建设，增加学校数量提高居民教育水平，改善水、电、网络、交通等设施提高居民生活质量，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境，提供更加优越的市场环境与营商环境，进一步促进了创业活跃度，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创业活跃度所发挥的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所占比例较小,可能有以下原因:第一,甘肃省偏远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水平仍处于落后水平,居民自身的禀赋和金融素养有限,无论是创办私营企业还是个体工商户都依赖于认知水平,知识储备与综合素养是创业成败的关键因素,因此对于大多数创业机会欠发达地区的居民仍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第二,创业活跃度不仅以来居民自身禀赋,还受当地经济发展状况的制约,虽然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为居民提供一定的物质资本,但落后地区无法提供行业发展的市场基础,降低了居民的从业岗位;第三,拥有足够知识储备和综合素养的创业人员会自发寻找适合其行业发展的地点,远离资源匮乏环境恶劣地区,并且很难将自身事业发展福利向贫困地区辐射,进一步拉大了地区经济差异,这些原因就降低了创业活跃度在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中介效应。

表 5-6 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

	Cmp	Epa	Cmp
	(1)	(2)	(3)
difi	0.161*** (0.009)	0.073*** (0.008)	0.137*** (0.098)
epa			0.331*** (0.011)
is	0.022** (0.009)	-0.009 (0.008)	0.025*** (0.009)
edl	-0.601*** (0.198)	-0.014 (0.183)	-0.596*** (0.190)
gdp	0.209*** (0.017)	0.093*** (0.015)	0.178*** (0.018)
gi	-1.316*** (0.116)	-0.474*** (0.107)	-1.159*** (0.120)
ol	0.138*** (0.032)	0.080*** (0.029)	0.112*** (0.031)

续表5-6创业活跃度的中介效应

	Cmp	Epa	Cmp
	(1)	(2)	(3)
_cons	0.209*** (0.039)	0.030 (0.036)	0.199*** (0.037)
R-squared	0.8713	0.6162	0.8833
N	120	120	120
时间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 6 结论及对策建议

### 6.1 结论

本文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方面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作用。首先梳理了相关文献，分析了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的发展现状；其次围绕共同富裕的核心内涵和实现路径，基于甘肃省 2011-2020 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了甘肃省共同富裕指数；再次，通过理论分析提出研究假设；最后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推动高质量发展、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居民消费、减贫增收、促进乡村振兴和提升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促进共同富裕。

第二，近些年来，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子维度都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增长，各地级市从参差不齐变为相对均衡。但甘肃省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在全国仍处于落后水平，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还有较大潜力有待挖掘。

第三，用居民可支配收入、地区生产总值、恩格尔系数、社会保障水平、科研投入等五个指标对共同富裕的三个维度进行分析，2011-2020 年甘肃省在富裕度、发展性和可持续性上有了长效稳定发展，但整体水平和人均水平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速度偏慢，在全国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甘肃省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第四，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一级子维度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子维度中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经过内生性检验、改变被解释变量合成方法、缩尾处理、增加控制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以上结论仍成立。

第五，创业活跃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之间起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提高居民创新创业，推动了“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形成发展的良性循环，支撑了我国扶贫模式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巩固了我国脱贫攻坚成果，防止“断血”后的再次返贫，加快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

## 6.2 对策建议

### 6.2.1 加快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第一，政府应合理利用优惠政策，引导电信公司等信息产业提高网络服务质量，加快网络数据传输速度，增加5G网络覆盖率，推动区块链、物联网等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助力农村及偏远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覆盖率，通过降低资费等方式提高农村居民互联网使用率和智能手机使用率，降低网络基础设施的不均衡。

第二，金融机构在政府政策的支持下，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积，将目标服务群体下放到农村基层，依据市场状况合理提供金融优惠政策。在农村欠发达地区增加基层金融服务人员，充分了解地区发展状况，提供精准的金融服务。面对农村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助农”和“惠农”为宗旨，研发金融创新产品，为农村地区提供定制化金融服务。

### 6.2.2 鼓励大众创业，提高创业活跃度

第一，政府加大对创业的扶持，出台创业优惠政策，通过成立创业扶持基金、建设创业孵化园等保障措施推动创业带动就业。金融机构研发更多数字普惠金融的功能，为创业主体提供信贷、保险、理财、结算等一些列综合服务，充分激发创业活跃度在数字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之间的积极作用。

第二，政府积极考察其他发达地区的数字化创新发展模式，有针对性地合理引入，在本地复制和发展其他地区创新产业和发展模式，以退伍军人、大学生、下岗职工等群体为带头人，向其他自身禀赋缺乏辐射，带动局部的整体发展，实现“以点及面”。

第三，政府及金融机构应联合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创业。大学生作为重要人才资源，具有巨大的创造潜力，近年来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而一些欠发达地区又具有较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从政策和市场两方面为大学生创业提供保障，弥合地区人才需求和大学生的就业需求，充分挖掘大学生的创造潜力，一方面解决了大学生就业的社会保障问题，另一方面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问题也得到良

好的处理。

第四，高校等教育机构鼓励学生通过创业方式就业，引导大学生将就业意向地点下沉到农村基层，并着力开展创业课程，为大学生创业提供理论基础。大学生返乡创业也是理论结合实际的有效实践。高校应与地方政府和企业加强沟通与合作，一方面了解企业发展和当地经济现状，完善学生教育的培养体系，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另一方面助力地方经济发展寻求新的增长点。各高校联合举办创新创业大赛，重视针对农村及欠发达地区的选题方向，提高对项目可落地性的审核标准，挖掘适合当前发展的可行性项目，及时追踪和保障项目的实施，将创新创业促进共同富裕落到实处。

### 6.2.3 发展地方特色文旅经济

甘肃省文化底蕴深厚，自然风光优美，生态环境脆弱，限制了一些开放型产业的落地和发展。但甘肃旅游景点众多，有些偏远地区旅游服务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文旅产业有很大发展空间，为当地居民提供更多的创业岗位。加强数字普惠金融与旅游产业的相结合，助力居民依靠当地旅游景点及文化习俗从事经营活动，促进餐饮、住宿、文创等产业的发展。政府一方面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文旅产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金融支持，另一方面着力打造甘肃省各景点的旅游文化 IP，做好对外的宣传工作，支持文旅产业创业者稳定增收。

### 6.2.4 加强居民能力建设

第一，加强居民金融知识素养，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使用深度。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特性使其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而农村欠发达地区居民自身禀赋薄弱，阻碍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效果。因此，要加大对金融知识的普及与宣传，政府及监管机构通过广播、电视等渠道普及金融知识和金融诈骗案例，提高居民的自我保护意识。扶贫干部和志愿者进行线下金融知识讲座，建立金融知识教育试点，鼓励金融机构和当地高校开展合作，定期举办“知识下乡”活动，帮助农村居民更加深入地了解金融产品，提高居民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理解和使用。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加强营业网点内金融服务咨询台的管理，为金融服务需求者和附近居民提供专业的金融知识普及服务，同时加强产品销售过程中的讲解环节。

第二，加强对农村欠发达地区教育方面的金融支持，鼓励各金融机构开发助学贷款等产品，减轻贫困家庭的教育压力。同时，政府应完善职业教育平台，为农民、下岗职工提供更多接受职业教育的渠道。

### 6.2.5 强化金融监管和市场监管

数字普惠金融的数字性使得传统金融监管体系面临巨大的挑战，因此监管体系应积极应用先进网络技术，搭建数据中心、运用区块链技术，防止在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出现违规操作等金融乱象引发危机。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居民的创业活跃度，市场监管要保障私营和个体企业的有序增长，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政府在实行宽松政策的同时也要守好底线。新兴行业可能挑战法律的薄弱地带，因此要根据市场及时进行政策调整并加强立法，维护市场秩序，构建良好的市场环境。

## 6.3 本文的局限

本文从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证明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并且创业活跃度在其中起中介效应，有关本文研究还存在一下不足：

第一，共同富裕指标的测度在各个层面的衡量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尽管本文围绕共同富裕的内涵进行综合的指标设计，但囿于地级市层面数据的可得性，难以全面反应地区的共同富裕水平。

第二，本文只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其一级子维度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进行研究和检验，未分别深入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二级指标对共同富裕的作用。

第三，本文只在宏观层面上对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促进作用进行了验证，并未在微观层面进行分析验证，未来可以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做进一步研究。

## 参考文献

- [1]Christian Ahlin,Neville Jiang. Can micro-credit bring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7,86(1).
- [2]Sharon A. Alvarez,Jay B. Barney,Arielle M. B. Newman. The poverty problem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solution[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15,32(1).
- [3]Bernanke B S, Gertler M, Gilchrist S. The Financial Accelerator in A Quantitative Business CycleFramework[J]. Handbook of Macroeconomics, 1999,1:1341-1393.
- [4]Bruton, Garry D . Letter From the Editor: Business and the World's Poorest Billion--The Need for an Expanded Examination by Management Scholar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10.
- [5]Chuanjiang Yu,Nan Jia,Wenqi Li,Rui Wu.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nd rural consumption structure – evidence from Peking University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ial index and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J]. China Agricultural Economic Review,2022,14(1).
- [6]Dana, L., 2007,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Indigenous Entrepreneurship,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7]Fallon, Lucas.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es on Labor Markets, Household Incomes and Poverty: A Review of Evidence. 2000.
- [8]Guyuan Han, Youfei Hu,Yuhan Zhang.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J]. Scientific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2019,1(5).
- [9]Jennifer T. Lai,Isabel K. M. Yan,Xingjian Yi,Hao Zhang.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Consumption Smoothing in China[J]. China & World Economy,2020,28(1).
- [10]Jian Ye, Xiaolan Huang. Is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 Booster for Community Prosperity?[J]. Frontiers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21,2(12).

- [11]Jonathan Kimmitt,Pablo Muñoz,Robert Newbery. Poverty and the varieties of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pursuit of prosperity[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20,35(4).
- [12]Leff, N. H.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roblem Revisited,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9,17 (1).
- [13]Li J, Wu Y, Xiao J J.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e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Evidence from China[J]. Economic Modelling, 2020,86:317-326.
- [14]Ted London,Heather Esper,Andrew Grogan-Kaylor,Geoffrey M. Kistruck. Connecting Poverty to Purchase in Informal Markets[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2014,8(1).
- [15]Park C, Mercado R. Financial Inclusion, Poverty,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Developing Asia[R].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5(426).
- [16]Peredo A M , Anderson R B , Galbraith C S , et al. Towards a theory of Indigenous development[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ship and Small Business, 2004, 1(1/2):1.
- [17]Ana María Peredo,Murdith McLean. Indigenous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ural Captivity of Entrepreneurship[J]. Business & Society,2013,52(4).
- [18]Prahalad C K , Hammond A . Serving the world's poor, profitably.[J]. Harvard Bus Rev, 2002, 80(9):48-57.
- [19]Qinghan Zeng, Qing Tang, Hao Shi.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China's Labor Income Share[J]. Scientific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Research,2022,4(1).
- [20]Paul M. Rome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6,94(5).
- [21]Seelos, C. and Mair, J. Profitable Business Models and Market Creation in the Context of Deep Poverty: A Strategic View,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2007,21(4).
- [22]Shuang Song, Baiyang Zhang, Wen Zhang.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on Residents' Consumption Upgrade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

- attern -- Based on the Provincial Panel Quantile Model[J]. *Frontiers in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22,3(2).
- [23]Christopher J. Sutter,Justin W. Webb,Geoffrey M. Kistruck,Anastasia V.G. Bailey. Entrepreneurs' responses to semi-formal illegitimat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2013,28(6).
- [24]Wang Zerong,Zhang Donghao,Wang Jiancheng. How does digital finance impact the leverage of Chinese households?[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22,29(6).
- [25]Iii G , Bamford C E , Marsden J W . Contrasting Entrepreneur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merging Latin American Economies: Applications and Extensions of Resource-Based Theory[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 Practice*, 2010, 32(1):15-36.
- [26]钞小静,任保平. 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理论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财经问题研究*, 2022, No. 464(07):3-11.
- [27]陈亚军.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 2022(06):121-132.
- [28]郭峰、王靖一、王芳、孔涛、张勋、程志云,《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2020年第19卷第4期,第1401-1418页。
- [29]关信平. 现阶段我国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社会政策目标及路径[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59(03):5-11.
- [30]韩亮亮,彭伊,孟庆娜. 数字普惠金融、创业活跃度与共同富裕——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 *软科学*, 2023, 37(03):18-24.
- [31]赫国胜,耿哲臣,蒲红霞. 数字普惠金融与可持续减贫——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4(03):22-31.
- [32]何德旭,王学凯. 金融如何助力共同富裕[J]. *财经智库*, 2022, 7(01):5-20+145-146.
- [33]胡善成,张彦彦,张云矿. 数字普惠金融、资本错配与地区间收入差距[J]. *财经科学*, 2022(05):1-14.
- [34]蒋长流,江成涛.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 2

- 58 个城市的经验证据[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3(3): 75-84.
- [35] 蒋永穆, 谢强. 坚持人民至上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J]. 山东社会科学, 2022(04): 53-61.
- [36] 焦云霞.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 发展逻辑、时空格局与区域差异[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50(03): 52-66.
- [37] 金婧. 共同富裕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振兴的影响——基于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J]. 商业经济研究, 2022(04): 177-180.
- [38] 李军鹏. 共同富裕: 概念辨析、百年探索与现代化目标[J]. 改革, 2021(10): 12-21.
- [39] 李林汉, 李建国. 数字普惠金融、经济开放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效应[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11): 104-108.
- [40] 李智, 何浩淼. 数字经济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1(09): 18-22.
- [41] 刘培林, 钱滔, 黄先海, 董雪兵. 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 管理世界, 2021, 37(08): 117-129.
- [42] 刘心怡, 黄颖, 黄思睿, 张桃霖. 数字普惠金融与共同富裕: 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J]. 金融经济研究, 2022, 37(01): 135-149.
- [43] 陆培丽, 彭兰凌, 沈嘉琪, 金衍瑞, 耿涌. 实现共同富裕的创新手段: 碳转移支付[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2, 37(08): 1132-1142.
- [44] 吕爽, 谭军华, 刘帅, 吴旷. 中国创新创业活跃度的连续动态测度及时空差异分解[J]. 统计与决策, 2022, 38(07): 72-76.
- [45] 李晓园, 刘雨濛.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农村创业?[J]. 经济管理, 2021, 43(12): 24-40.
- [46] 马艳, 冯璐, 宋欣洋. 我国非公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作用的理论分析[J]. 经济纵横, 2022(05): 11-20+135.
- [47] 齐红倩, 张佳馨. 共同富裕进程中先富地区消费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2(04): 10-22.
- [48] 钱海章, 陶云清, 曹松威, 曹雨阳.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

- 证[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06):26-46.
- [49]覃诚, 方向明. 三十年来中国共同富裕研究进展——基于 CiteSpace 文献计量分析[J]. 兰州学刊, 2022(05):24-35.
- [50]斯晓夫, 严雨姗, 傅颖. 创业减贫前沿理论研究与未来方向[J]. 管理世界, 2020, 36(11):194-207.
- [51]涂颖清, 万建军.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J]. 企业经济, 2022, 41(05):41-49.
- [52]万海远. 共同富裕的改革路径与推进逻辑[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37(03):23-34.
- [53]万海远, 陈基平. 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量化方法[J]. 财贸经济, 2021, 42(12):18-33.
- [54]万倩雯, 卫田, 刘杰. 弥合社会资本鸿沟:构建企业社会创业家与金字塔底层个体间的合作关系——基于 LZ 农村电商项目的单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19, 35(05):179-196.
- [55]汪亚楠, 谭卓鸿, 郑乐凯. 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保障的影响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37(7):92-112.
- [56]王永仓, 温涛. 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异质性研究[J]. 现代经济探讨, 2020(11):56-69.
- [57]魏后凯. 实现共同富裕需显著缩小城乡差距[J]. 财贸经济, 2021(8):9-12.
- [58]温忠麟, 叶宝娟. 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J]. 心理科学进展, 2014, 22(05):731-745.
- [59]吴卫星. 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助力实现共同富裕[J]. 财贸经济, 2021(8):16-19.
- [60]邢小强, 仝允桓, 陈晓鹏. 金字塔底层市场的商业模式:一个多案例研究[J]. 管理世界, 2011(10):108-124+188.
- [61]邢小强, 周平录, 张竹, 汤新慧. 数字技术、BOP 商业模式创新与包容性市场构建[J]. 管理世界, 2019, 35(12):116-136.
- [62]徐光顺, 冯林.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再检验——基于农户人力资本投资调节效应的视角[J]. 农业经济问题, 2022(05):60-82.

- [63]许永兵.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22, 43(03):34-41.
- [64][1]徐政, 郑霖豪. 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8(04):39-52.
- [65]薛莹, 胡坚. 金融科技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理论逻辑、实践基础与路径选择[J]. 改革, 2020(3):53-62.
- [66]杨林, 赵洪波.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民增收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检验[J]. 山东社会科学, 2022(04):149-155.
- [67]杨宜勇, 王明姬. 更高水平的共同富裕的标准及实现路径[J]. 人民论坛, 2021(23):72-74.
- [68]易行健, 周利.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 金融研究, 2018(11):47-67.
- [69]郁建兴, 任杰. 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政策议程[J]. 政治学研究, 2021(03):13-25+159-160.
- [70]袁媛.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本质特征与实现路径[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8(04):28-38.
- [71]翟仁祥, 宣昌勇. 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城市创业活跃度吗[J]. 现代经济探讨, 2022(05):76-87.
- [72]张金林, 董小凡, 李健.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 ——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研究[J]. 财经研究, 2022, 48(07):4-17+123.
- [73]张蕊, 余进韬. 数字金融、营商环境与经济增长[J]. 现代经济探讨, 2021(07):1-9.
- [74]张扬金, 邓观鹏, 陈林夕.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公众认知研判与提升策略[J]. 长白学刊:1-8[2022-06-15].
- [75]周立, 陈彦羽.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居民收支差距: 理论机制、经验证据及政策选择[J]. 世界经济研究, 2022(05):117-134+137.
- [76]周林洁, 韩淋, 修晶.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基于产业发展的视角[J]. 南方金融, 2022(04):70-78.
- [77]周文, 司婧雯. 民营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J]. 财经问题研究, 2022(10):3-12.

- [78]朱萌萌, 林子华. 新就业形态促进共同富裕的路径考察与对策——基于马克思就业理论与共富思想[J]. 当代经济管理, 2022, 44(09):9-15.

## 附录 1 共同富裕指数计算结果（熵值法）

年份 城市	兰州市	嘉峪关市	金昌市	白银市	天水市	武威市	张掖市	平凉市	酒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陇南市
2011	0.345633	0.453818	0.345240	0.156198	0.131968	0.139547	0.182514	0.110895	0.231718	0.115082	0.101534	0.055989
2012	0.371109	0.489825	0.392845	0.165836	0.128583	0.137861	0.184062	0.113074	0.256330	0.130278	0.129505	0.059373
2013	0.396029	0.494974	0.406905	0.183239	0.159905	0.167802	0.218858	0.131153	0.275629	0.130624	0.150768	0.096611
2014	0.408405	0.554382	0.457621	0.215493	0.163493	0.182612	0.235837	0.173957	0.292185	0.169159	0.152070	0.090896
2015	0.431141	0.565502	0.527731	0.235901	0.189882	0.221022	0.263258	0.184070	0.316925	0.180086	0.182676	0.124768
2016	0.460616	0.598800	0.476857	0.257308	0.197969	0.240237	0.300359	0.219769	0.327170	0.191565	0.178067	0.142780
2017	0.508049	0.616052	0.530949	0.306139	0.265583	0.290810	0.362269	0.271246	0.349788	0.226687	0.234504	0.186047
2018	0.542465	0.661447	0.529774	0.312822	0.286220	0.332920	0.412467	0.291342	0.403146	0.247955	0.243189	0.211709
2019	0.567120	0.679099	0.529210	0.317442	0.295216	0.336084	0.430736	0.297334	0.396815	0.256172	0.248954	0.278184
2020	0.601122	0.672800	0.593397	0.337939	0.319892	0.390115	0.459902	0.316298	0.442159	0.276159	0.270696	0.239813

## 附录 2 共同富裕指数计算结果（主成分分析法）

年份 城市	兰州市	嘉峪关市	金昌市	白银市	天水市	武威市	张掖市	平凉市	酒泉市	庆阳市	定西市	陇南市
2011	0.298694	1.057385	0.509296	-0.327275	-0.672571	-0.608004	-0.419530	-0.711056	-0.140087	-0.723643	-0.890361	-1.020532
2012	0.374276	1.277661	0.624332	-0.294364	-0.635185	-0.580229	-0.412265	-0.663053	-0.052996	-0.663383	-0.882403	-0.996095
2013	0.465799	1.379903	0.698792	-0.248015	-0.627554	-0.507759	-0.345983	-0.625213	0.042163	-0.656797	-0.855531	-0.949284
2014	0.482178	1.597115	0.864920	-0.194947	-0.576026	-0.434609	-0.241349	-0.518610	0.077214	-0.537733	-0.802085	-0.903295
2015	0.541766	1.180034	1.085632	-0.179585	-0.546342	-0.333278	-0.087838	-0.573663	0.183302	-0.512072	-0.752566	-0.869976
2016	0.638369	1.999090	0.841854	-0.166672	-0.502041	-0.242219	0.009169	-0.423838	0.247499	-0.476634	-0.673498	-0.802113
2017	0.769318	1.982488	0.828311	-0.003001	-0.427864	-0.152156	0.085495	-0.376355	0.267128	-0.447080	-0.575383	-0.737480
2018	0.849997	2.024554	0.799392	0.021745	-0.292240	-0.007377	0.188207	-0.263841	0.386500	-0.356477	-0.501339	-0.630246
2019	0.922368	2.169916	0.859752	0.086729	-0.249821	-0.018782	0.247356	-0.206225	0.407830	-0.310767	-0.428126	-0.411315
2020	0.954863	2.172657	1.034579	0.126162	-0.187402	0.178350	0.319570	-0.159890	0.522169	-0.238239	-0.367832	-0.472481

## 致 谢

三年的研究生求学之路即将结束，同时也意味着学生生涯即将画上句号。这三年的时光充满喜怒哀乐，回忆顿时涌上心头。

饮其流者怀其源，学其成时念吾师。首先感谢我的导师狄瑞鸿教授，从选题到整个论文撰写的过程中，狄老师给予了十分耐心的指导，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老师严谨的学风、渊博的知识修养都让我受益良多。在生活中，老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让我感受到了像家一样的温暖。同时，感谢授课老师三年间的传道解惑，愿所有师长工作顺利、平安顺遂。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我出生于山东农村，能一路读到硕士离不开父母的辛勤工作。在成长的过程中，父母给了我太多的理解和陪伴，不论是求学还是生活，他们尊重我的每一个决定，支持我的每一个选择。感谢我的父母养我、育我，除我后顾之忧，予我暖衣饱食。我知道生活从来都不容易，当我觉得容易的时候，是父母在负重前行。接下来的日子，愿父母身体健康，幸福长寿。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感谢我的研究生舍友，三年同窗同寝，早已如同亲人一般。我们一起出去游览西北的大好河山，也是人生中的宝贵财富。感谢我的同门同学，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了我很多重要的建议和指导。衷心祝愿我的同学和好友以梦为马，不负韶华。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天涯未远，江湖再见。即见君子，云胡不喜。

山水相逢，终有一别。论文可以停留在第六章，但人生还要继续写，愿你我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